

国 语 直 解

来可泓 撰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前 言

1939年我小学毕业，正处在烽火遍地的抗日战争时期，不能过钱塘江到杭州上中学，只好在家乡前清举人何笙甫老先生私塾就读，《国语》是在读完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以后读的，用的是毛边纸家藏仿宋大字本，先生用硃笔句读，逐篇通读。先生高兴时也会讲骊姬挑拨离间杀害太子申生、程婴救孤儿赵武、句践（一作“勾践”）卧薪尝胆等故事给我们听，在我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至今有些篇章还能琅琅背诵。

《国语》的性质

《国语》是以记言为主的历史名著。既是一部春秋时期的国别史，又是一部历史散文。三国吴韦昭在《国语解叙》中说：“（左丘明）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，下迄鲁悼智伯之诛，邦国成败，嘉言善语，阴阳律吕，天时人事逆顺之数，以为《国语》。”从中可以体察到《国语》所包含的以历史为主、兼有文学的双重性质。

就历史性来看，诚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“《国语》是‘以国分类’，‘以语为主’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国别史”（《中国历史文选》

上册,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。它记载上起周穆王十二年(前990)征犬戎,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(前453)韩、赵、魏联合灭智伯的五百多年历史。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语,共二十一篇,即《周语》三篇,《鲁语》两篇,《齐语》一篇,《晋语》九篇,《郑语》一篇,《楚语》两篇,《吴语》一篇,《越语》两篇。《周语》内容占全书三分之一,从周穆王开始至周敬王为止。《晋语》从晋武公开始至晋哀公为止,内容几占全书二分之一左右,难怪有人把《国语》看成是晋国历史。《鲁语》从鲁庄公齐、鲁长勺之战开始,终于鲁哀公。《齐语》专记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之事,其史料与《管子·小匡篇》相同而略有增删。《郑语》仅记郑桓公规划立国之事。《楚语》从楚庄王开始,终于楚惠王时白公胜之乱。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记吴王夫差与越王句践争霸之事。其史料价值大体以《周语》和《楚语》为较高,《晋语》、《鲁语》、《郑语》次之。《齐语》、《越语》、《吴语》的史料价值不能与以上五个部分相比。《国语》虽然由单篇论说构成,不相统属,但以国分类,按各国君主年代记言、论事,展示了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横断面,仍是一部体例完整的史书,并无割裂之感。它为今后分国编史开创了先例,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就文学性来看,《国语》以记言为主,通过言论来反映事实,文字朴实凝重,词藻典雅华丽,分别是一篇篇首尾完整、各有中心的历史散文。它记叙了治国安邦之道,称霸诸侯之术,克敌制胜之策,罗致贤才之法,发展经济之路,凝聚民心之教,天时人事之应,明辨尊卑之礼,修身律己之事。忠贞奸佞,美善丑恶,是非曲直,一一判明。诚如柳宗元在《非国语》中说:“深闳杰异,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。”为历代文学家所珍重,对推动我国历史散文

的发展,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现代王树民先生在《史部要籍解题》中提出:《国语》为古代记言形式编成的一种“语书”。并引《楚语上》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时“教之《语》,使明其德,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”的话为证。顾静先生也在邬国义等《国语译注·序》中指出:《国语》是古人言论汇编的一部语书,类似《世说新语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短语》。他除引用《楚语上》申叔时的话作证外,并引用《尹文子·大道》中“语曰”,以及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《春秋事语》作为佐证。他们把《国语》看出是“语书”,有创新之意,自是一家之言,可供参考。

《国语》的特点

《国语》既是一部春秋时期的国别史,又是一部历史散文集,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。

首先,以礼治国,以礼修身的礼学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。什么是礼,礼是根据社会需要,特别是领袖及其集团根据统治的需要而创制的行为规范。一国有一国之礼,一代有一代之礼。它包括“礼”和“仪”两个方面,这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统一体。礼是内容,仪是形式;礼是本质,仪是表象。孔子说:“礼云、礼云,玉帛云乎哉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意思是说:“礼呀、礼呀,仅仅是说玉器、丝帛这些祭物、祭品吗?”显然不是,它指出了礼的实质是治国,“为国以礼”而不是追求形式的“仪”。在我国古代礼是治国安民的行动准则,它要求统治者以礼治国,以礼修身。《国语》就是根据以礼治国,以礼修身这一主导思想,组织、

编纂邦国成败，嘉言善语等史事的。

西周之所以灭亡，就是因为统治者不能以礼治国，以礼修身，礼崩乐坏。周穆王炫耀武力，违背德礼，讨伐犬戎，失去威信。周厉王纵容荣夷公实行专利，与民争利；任用卫巫监视群众，箝制舆论，不能以礼治国，终于被流放于彘。周宣王虽有中兴之名，但仍不循礼法，随心所欲，立鲁武公幼子戏为鲁君，导致在诸侯中失去威望。特别是周幽王，宠幸褒氏，玩忽礼制，废长立幼，戏弄诸侯，既不能以礼治国，又不能以礼修身，终于导致西周的灭亡。而齐桓公之所以能崛起于东方，称霸于诸侯，在于听从管仲的意见，以礼治国，亲仁善邻，打出尊王攘夷旗号，礼乐征伐，赢得了诸侯的拥护，确立了霸主的地位。晋国献公、惠公统治时期之所以国家动荡不安，民力弊疲，在于献公不能以礼治国，以礼修身，废太子申生，立奚齐为太子，宠骊姬而乱公室。及惠公即位，又背外内之赂，杀功臣，宠小人，违礼违德，导致身死之后，其子怀公被晋文公所杀。而晋文公之所以能崛起称霸，自然又在于他能以礼治国，以礼修身，尊重贤臣，尊重天子，以礼义教育人民，因而受到诸侯的尊重和拥戴。晋国霸业之所以能持续较长时间而不衰，就在于文公之后的历代君主，均能坚持以礼治国原则，互相谦让，团结一致的缘故。楚国之所以能在南方崛起，也是由于从楚武王以来尊重贤才，任用贤才，以礼治国。而楚灵王以后国势衰落，也就是不能执行以礼治国，以礼修身方针，奢侈浪费，砌造章华之台，修筑大城，妄想称霸于诸侯而走向反面。

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样，鲁国公父文伯之母，能以礼修身，循礼而行，在《论语》中歌颂他的材料占八篇之多，晋卿范文子能

接受先辈教育，谦虚谨慎，循礼而行，受到人们的赞扬。屈建祭父以大夫之礼，违背其父以菱角祭奠遗命，看似违礼而实尊礼，受到后人的赞扬。而驺姬谗杀申生，违背礼制，受到人们的鞭挞。所以《国语》为人们揭示了一条规律：这就是以礼治国、以礼修身者，国必兴，身必荣；不能以礼治国，以礼修身者，国必亡，身必辱。贯穿全书，含义是非常深刻的。

第二，《国语》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史。《国语》记载少量西周史事外，大量记载春秋各国的史事，构成一部齐、晋、楚、吴、越的争霸史。西周本是诸侯的共主，正由于西周的灭亡，才出现了春秋大国争霸的局面。所以西周是作为背景材料来铺垫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局面出现的。《郑语》选择史伯建议郑桓公占领以新郑为中心的济洛河颍为根据地，就是突出春秋初年郑国首霸的形势。西周末期，郑桓公为幽王卿士，威望甚高，西周灭亡，桓公殉幽王之难。其子武公，率兵保护平王东迁洛邑，建立大功。其子庄公又继任为平王卿士，春秋初年，号称小霸。齐国是一个东方大国，擅渔盐之利，从姜尚建国以来有不少史事可以记载，但《齐语》仅选用管仲如何相桓公霸诸侯的史事，足以说明作者着眼于组织争霸史料，这是再明显不过了。《晋语》的史料较多、较集中，仔细分析，也侧重于记载晋国称霸历史。一则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称霸时间较长，晋献公时开始称霸西方，在此基础上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，襄公继位，霸业未衰，随后逐渐衰落，至晋悼公复霸，直至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，晋国在名义上一直成为诸侯盟主。二则勾画出春秋时期主要是晋、楚抗衡，南北争霸的历史轨迹。就《楚语》来看，选取楚庄王至楚惠王时的史事，也着眼于楚国霸业由兴盛到衰落到再兴盛的过程。至于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仅

记吴王夫差、越王句践一代的争霸史料。由此可见，西周灭亡，平王东迁，进入春秋时代，郑国首霸，管仲相桓公霸诸侯，为五霸之首，随后晋文公崛起，取代齐国成为中原霸主。同时楚庄王一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在南方崛起，北上争霸。在长达一百馀年的时间里，晋、楚两国此消彼长、彼消此长，形成春秋时期南北争霸的总格局。随着晋、楚的衰落，吴、越相继争霸，这已是春秋争霸的尾声了。阅读《国语》，一部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史就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。

其三，《国语》是一部优美的历史散文。《国语》全书二百六十一篇（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《国语》点校本统计）不论篇幅大小，都是首尾完整，各有中心，情节曲折、逻辑严密，文字优美的散文。诸如《邵公谏厉王弭谤》、《里革断罟匡君》、《观射父论绝地天通》、《王孙圉论国之宝》、《勾践灭吴》都是历代名篇，被历代文选家选入《文选》，供人们学习、赏析、借鉴。

《国语》基本采用对话手法，从君臣之间、大臣之间的对话中阐述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内容，表达思想观点。即使在《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》中，虽记叙彘之乱时，国人索幽王之子宜臼，而邵公以其子代宜臼，交给国人处死之事，也记录了邵公的言论，表达他此时此地忠于王室而无怨恨的思想感情。如《卫庄公祷》中，本是卫庄公在参加铁之战前祈求列祖列宗保佑，不要伤筋动骨的独白，但也记了赵简子的插话。这种对话，有问有答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构成文章，别有情趣。

《国语》多录谏言。这种进谏，形式多样。有正面进言。如《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》等，引经据典，设譬取喻，正面说理，以这种形式为最多。有正话反说，如《叔向谏杀竖襄》。有用行动强

行谏阻，如《里革断罟匡君》。有犯颜死谏，如《申胥自杀》。有巧妙进言，如《史请谏赵简子田于螭》。有反衬进谏，如《宋襄公赠重耳以马二十乘》。有激战中进谏，如《文公出阳人》等。同是进谏，形式多样，人物性格，一一展示，细细赏析，启发良多。

《国语》善于塑造人物形象。往往寥寥数语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，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。如《骊姬譖杀太子申生》中，展现了骊姬心狠手辣、口蜜腹剑、狡猾阴险、恃宠而骄的贵夫人形象。展现了优施利用俳優身份，与骊姬狼狈为奸的教唆者、帮凶者的形象。展现了里克不敢坚持正义，鼠首两端的中立者形象。展现了申生心存良善，被迫害而不敢反抗的形象。如《蓝尹亶避昭王而不载》中，展示了蓝尹亶是一个巧舌如簧，能说会道的人。展示了楚昭王是一个有人君之量的君主，展示了子西是一个愿意倾听意见、吸取教训的人。总之在作者笔下，邵公、管仲、齐桓公、晋文公、范文子、伍子胥、范蠡、季文子等正面人物；荣夷公、伯嚭等反面人物，无不有血有肉地凸现出来，让人赞颂，也让人鞭挞。

《国语》善于采用幽默语言，开展故事情节，展示人物心理活动。如《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》中写道：“（文公）醒，以戈逐子犯，曰：‘若无所济，吾食舅氏之肉，其知饜乎！’舅犯走，且对曰：‘若无所济，余未知死所，谁能与豺狼争食？若克有成，公子无亦晋之柔嘉，是以甘食。偃之肉腥臊，将焉用之？’”幽默而诙谐的语言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构成了一出戏剧，令人在捧腹中深思。如《董叔欲为系援》中，叔向“求系，既系矣；求援，既援矣”幽默而诙谐的语言，辛辣地讽刺了一心想攀高枝、向上爬的董叔。

总之，《国语》篇篇散文，从布局谋篇，人物刻画，写作手法选

择,语言运用,都给后人写作散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第四,《国语》汇集了春秋时期丰富的资料。《国语》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必读之书,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字,从典章制度到文化知识,给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资料。如在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中》,保存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阴阳学说的记载。在《史伯为桓公论兴衰》中,史伯“和同之论”,通过“五行相杂”来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,并在万物与五行关系的论述中,提出“和”与“同”这对范畴,开后世“和同之辨”的先河。如《观射父论绝地天通》,保存了观射父关于人、神关系以及原始宗教的看法。如《范蠡论天时人事》中,保存了阴阳转化及其对立统一关系的重要思想,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如在《胥臣论教诲之力》中,保存了我国最早的论述教育在个性发展中的作用的资料。在《悼公即位》中,保存了我国古代选拔师资的资料。在《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》中,保存了我国古代关于教育原则、教育内容、教育目的、教育方法的资料,为我们研究教育史不可多得的材料。如在《曹刿论战》、《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》中,保存了“王天下者必先诸民”的民本思想。在《管仲佐桓公为政》中,保存了我国古代选举贤才的制度。在《管仲教桓公足甲兵》中,保存了允许犯人出军需品赎罪和处以罚金赎罪的制度,为研究我国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翔实资料。又如在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》中,保存了古代帝王亲耕籍田,王后亲蚕的制度。在《襄王拒晋文公请隧》中,保存了古代天子、诸侯的墓葬制度。在《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》中,保存了古代对不同对象,选用全烝、房烝、肴烝三种不同的宴享之礼。在《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》中,保存了古代国君相见,设宴招待,赋诗对答,揖让进退的礼仪制

度。在《观射父论祀牲》中，保存了我国古代祭祀用牲制度。在《郤至甲冑见客》中，保存了在战场上将军见敌方国君之礼。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料。此外，在《医和视平公疾》中，医和分析“虫、皿为蛊”，保存了我国早期的一条训诂学资料。在《师旷论乐》中保存了音乐史资料，在《伍举论台美而楚殆》中，保存了美学资料，都是非常珍贵的。

《国语》还保留了许多嘉言警句，至今还有其强大的生命力。诸如“楚材晋用”，“尾大不掉”，“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”，“上行下效”，“卧薪尝胆”，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，“耀德不观兵”，“以小人之腹，为君子之心”，“小丑备物，终必亡”，“忧德不忧贫”，“武不可亵，文不可匿”，“有忧无匮，有逸无罢”，“以俭足用则远于忧”，“人臣而侈，国家弗堪，亡之道也”，“众心成城，众口铄金”，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，“善有章，虽贱赏也；恶有衅，虽贵罚也”，“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；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”，“亡人无亲，仁信以为亲”，“避君三舍”，“君以为易，其难也将至矣；君以为难，其易也将至矣”，“国之将兴也，君子自以为不足；其亡也，若有馀”。这些话都可置座右，以为思想之警惕，行为之准则，意义是非常深远的。

《国语》的作者

《国语》的作者，至今还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。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”东汉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中承袭其说曰：“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传（《左传》），又纂异同为《国

语。”并在《汉书·艺文志·春秋类》说：“《国语》二十一篇，左丘明著。”三国吴韦昭在《国语解叙》中说：左丘明作《左传》以后，“雅思未尽”，又“以为《国语》”。故从西汉以来，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都被看成是左丘明所作的姊妹篇，《左传》解经，称为《春秋内传》，《国语》不主于经，故称《春秋外传》。但自唐以后，有人就提出怀疑，认为《国语》与《左传》“事辞或多异同，文体亦不类”，“必非出自一人之手”（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），引起争议。近代新史学兴起，怀疑《国语》非左丘明所作之说复兴，但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。我们认为《国语》非出自左丘明之手，而是战国初期熟悉各国历史掌故的人，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，加工整理，汇编而成。

《国语》的流传、注释

《国语》约成书于战国时期，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厄运，至西汉休养生息后，经济繁荣，《国语》复出传世。西汉武帝元朔五年（前124）下诏搜访遗书，至汉成帝河平三年（前26）再次下诏访求遗书。至此，中府藏书山积，便指定刘向等在秘阁校讎国家藏书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：“《新国语》五十四篇，刘向分国语。”可见刘向曾将《国语》二十一篇，分编为五十四篇。但这个本子早就佚失，我们已不可得见。由于当时史籍较少，故刘歆编《七略》，把史书附在《六艺略》中，而《国语》则附于《六艺略·春秋类》之下。至西晋荀勗编《晋中经新簿》，虽按甲、乙、丙、丁分类，把史书从《六艺略》中析出，独立成丙部，但《国语》仍在《经部·春秋类》下。至清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修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才将《国

语》列入《史部·杂史类》。

由于《国语》长期被目录学家列在《经部·春秋类》中，处于准经典地位，所以从汉以来著名的经学家郑众、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唐固等人都为它作过校释和注解，但这些注本均没有流传下来。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、最完备的注本是三国吴韦昭的《国语解》，它保存了郑众、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唐固等人的训释、注解，并“参之以五经，校之以内传，以《世本》考其流，以《尔雅》齐其训”（韦昭《国语解叙》），对《国语》中的字词、名物、制度、史事都作了较为精详的训释和校注，为人们所重视。目前通行的韦昭《国语解》刻本，出于宋刻者有两种：一为宋公序补音本，一为明道本，分别在《四部备要》和《丛书集成》中可以见到。特别是明道本，附有清人黄丕烈的校勘札记二卷，甚便学者。到了清代，考据之学兴盛，对《国语》的校注、考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。较著名的有洪亮吉《韦昭国语注疏》、董增龄《国语正义》和汪远孙《国语三君注辑存》、《国语发正》、《国语明道本考异》（合称《国语校注本三种》）。近人徐元诰《国语集解》和吴曾祺《国语韦解补正》亦便参考。其中《国语集解》采集详备，尤为精审，将清代学者整理《国语》的成就大体收入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《国语》校点本，以韦昭注为基础，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，颇便阅读。

关于《国语直解》

《国语直解》是《国语》的今注、今译、评析解读本，旨在帮助读者扫除古今语言障碍，读懂《国语》，领会思想内容，赏析优美文采，提高道德素养和阅读古籍能力。

《国语》旧本向无篇名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校点本根据每篇中心内容冠以题目，以利读者。本书沿用其成例，但对较长的篇章则根据内在的逻辑结构、段落层次析为数篇，另立题目，以便阅读。如《史伯为桓公论兴衰》，则析为《史伯论郑应据济洛河颍以自固》、《史伯论周衰楚秦齐将兴起》、《史伯论谢郑之间可取而用之》、《史伯论西周必然衰亡》、《史伯论晋将代周而兴》五篇。如《句践灭吴》，则析为《吴许越成》、《句践忍辱负重矢志报仇雪耻》、《越不许吴成夫差自杀》三篇等。但为了保留上海古籍校点本原貌，在目录中将本书所析的篇目，低两格列于原题之下以示区别。

本书仍按《论语直解》体例，对《国语》的每篇文章，先作解題。揭示其主题，概括其内容，理清其结构，指出其意义，起概略的提示作用。其次，列出原文。加上标点，划分段落，便于对照阅读。第三，今译。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，用现代汉语加以直译，在上下难以贯通之处，则适当加以意译。第四，注释。对原文中的难字用拼音字母注音，并注同音汉字。对词义、地名、人物、典章制度、历史沿革、风俗习惯等，简明扼要地加以注释。第五，评析。改《论语直解》中的“评述”为“评析”。逐篇从不同侧面，有重点地加以赏析。或阐明其时代背景，或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，或理清其史实，或分析其人物形象，或探讨其写作特色、篇章结构，或发覆探幽揭示其深层含意，或探求其蕴含的思想哲理，既评又析，深入浅出，这是我用心最勤的地方。但由于水平有限，是否能将《国语》内涵的丰富的思想原意，深刻地、充分地、真实地直解出来，还望学者、读者不吝赐教。

本书的撰写和出版，我首先要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领

导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,衷心感谢责任编辑陈士强先生精心帮助拟定体例,审阅稿件,巧为剪裁,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本书在撰写过程中,参阅了不少先哲今贤的论著,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同时,我也要感谢妻子朱柏林,为了支持我的写作而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,并作为第一读者,为我提出修改意见,查漏补缺,纠正错讹。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”我殷切期望能从《国语》中汲取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,汲取追求进步力量,总结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,推进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。

来可泓于上海大学慎俭居

2000年1月5日

卷一 周语上

祭公谏穆王征犬戎

【解题】本篇记叙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征讨犬戎的言论。以“先王耀德不观兵”立论，引证史实，说明为国者要以德服人，不可滥用武力；要遵守五服之制，伐非其罪。否则，劳师远征将会尝到既损国威，又失人心的苦果。穆王不听，果如其言。

穆王将征犬戎^①，祭公谋父谏曰^②：“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观兵^③。夫兵戢而时动^④，动则威^⑤，观则玩^⑥，玩则无震^⑦。是故周文公之《颂》曰^⑧：‘载戢干戈^⑨，载櫜弓矢^⑩。我求懿德^⑪，肆于时夏^⑫，允王保之^⑬。’先王之于民也，懋正其德而厚其性^⑭，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^⑮，明利害之乡^⑯，以文修之^⑰，使务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^⑱。

“昔我先王世后稷^⑲，以服事虞、夏^⑳。及夏之衰也^㉑，弃稷不务^㉒，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、狄

之间²³，不敢怠业²⁴，时序其德²⁵，纂修其绪²⁶，修其训典²⁷，朝夕恪勤²⁸，守以敦笃²⁹，奉以忠信³⁰，奕世载德³¹，不忝前人³²。至于武王³³，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弗欣喜。商王帝辛³⁴，大恶于民³⁵，庶民不忍³⁶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³⁷。是先王非务武也³⁸，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³⁹。

“夫先王之制⁴⁰，邦内甸服⁴¹，邦外侯服⁴²，侯、卫宾服⁴³，蛮、夷要服⁴⁴，甸、狄荒服⁴⁵。甸服者祭⁴⁶，侯服者祀⁴⁷，宾服者享⁴⁸，要服者贡⁴⁹，荒服者王⁵⁰。日祭、月祀、时享、岁贡、终王，先王之训也⁵¹。有不祭则修意⁵²，有不祀则修言⁵³，有不享则修文⁵⁴，有不贡则修名⁵⁵，有不王则修德⁵⁶，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⁵⁷。于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⁵⁸，告不王⁵⁹。于是乎有刑罚之辟⁶⁰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⁶¹，是以近无不听⁶²，远无不服⁶³。

“今自大毕、伯士之终也⁶⁴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⁶⁵。天子曰：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’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⁶⁶！吾闻夫犬戎树悖⁶⁷，帅旧德而守终纯固⁶⁸，其有以御我矣⁶⁹！”

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，四白鹿以归⁷⁰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【今译】周穆王将要去征伐犬戎，祭公谋父规谏说：“不可。从前的圣王都是彰明美德而不炫耀武力。平时聚集兵力而在必要时动用，一动用就会显示出威力，使人畏服；轻易炫耀武力就会穷兵黩武，穷兵黩武就会失去震慑作用。所以，周公在歌颂武王的《诗经·周颂·时迈》一诗中说：‘收起兵器干戈，韬藏强弓劲矢，我王寻求美德，让它发扬光大遍及全中国。相信我王一定能永保这种美德。’从前的圣王对于百姓，总是勉励他们修正德性，使他们性情敦厚。为他们扩大财源，使他们富有，而且使他们的器物用具称心顺手。使他们明辨有德为利、失德为害的关系。用礼法来教育他们，使他们能趋利避害，感怀王的恩德而惧怕王的刑威。所以从前圣王的基业能世代相承而不断发展壮大。

“从前我们的先王弃和不窋相继担任农官，尽心奉事虞舜、夏启。到了夏朝衰败的时候，废罢农官，不重视农业生产，我们的先王不窋因此失去了农官的职务，只好自己逃匿到戎、狄之间的邠地，但仍不敢荒废农业，经常叙说先王弃的德行，继承先王弃的事业，修习先王弃的教导和法度。早晚恭谨勤劳于事业，用醇厚、笃实的作风加以持守，用忠实、诚信的思想加以奉行。从此，世世代代继承美德，不辱没前人。到了武王时，更加发扬前人光辉的美德，而加之以仁慈、和善，奉事神灵，保护百姓，神、人无不欢欣喜悦。商纣王辛，大为民众所痛恨，民众不能忍受他的残暴统治，都乐于拥戴武王，这样，武王才不得已而出兵商郊牧野。可见先王并不是崇尚武力，而是忧虑民众的痛苦而为他们除祸去患。

“先王的区域和贡赋制度是：王畿以内是甸服，王畿之外是侯服，侯、卫之服以外是宾服，蛮、夷地区是要服，戎、翟地区是荒服。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一次祭祖考所需的物品，侯服地